

有人说:红军长征犹如地球上醒目的红飘带,湘江战役是红飘带上“最沉重的绳结”——

突破湘江:中央红军的“生死之战”

“黄金时刻”稍纵即逝

长征之初,国民党军并不知道红军的去向。到1934年11月,红军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,快要接近湘江时,蒋介石才确定红军是要前往湘西,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于是,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“五路追剿”,即湖南湘军、广西桂军负责迎头堵击与两翼夹击,广东粤军和中央军尾追攻击,贵州黔军负责外围策应,目的是在桂湘边境的湘江流域消灭红军。

11月16日,桂湘两省军阀确定各自防区,双方以黄沙河为界,桂军担任兴安、全州、灌阳至黄沙河(不含)的防务,湘军则担任衡阳、零陵、东安至黄沙河(不含)的防务。随后,桂军以15个团(约3万人)摆在广西东北面,但桂系军阀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,不愿与红军死战,特别是担心自己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,却让中央军“占了便宜”。21日,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以红军进攻防线南段的龙虎关为由,把防线北段的部队全都调走,空出的阵地让湘军接手。湘军也不傻,他们也想保存实力,迟迟不肯派兵接防。结果,从22日到27日,湘江封锁线全州至兴安段“门户大开”,桂湘军阀想把红军“礼送出境”的意图显露无遗。

红军方面,11月22日,红一军团侦察兵到达全州后就发现这一变化,却因身边没有电台,直到25日他们返回主力驻地,中革军委才了解情况,遂决定分四路纵队直奔湘江渡口:第一纵队(红一军团之主力)沿道县、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;第二纵队(红一军团一个师、军委第一纵队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)经雷口关前进;第三纵队(红三军团、军委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)经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,相机占领灌阳,之后向兴安前进;第四纵队(红八、九军团)经永明向兴安前进。

作为全军先头部队,红一军团于27日抢占全州以南、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。这时,刚到全州的湘军按兵不动,而回援全州的桂军动作也不积极,他们的心思全放在防止中央军入桂上,只要红军尽早离开广西,大家都“相安无事”。红军冲过湘江的“黄金时刻”就在眼前,然而军委纵队行军太慢,26日走了8千米,27日走了6千米。究其原因,是博古、李德等决策者在长征时带上太多“坛坛罐罐”,时任红一军团一团参谋的肖思明描述:“一架印票子的机器,少说有一个排抬着;还有一架给病号用的机器(X光机),说怕碰怕跌,十几个战士像捧着瓷碗似的抬着它走。路这么窄,他们能走得快吗?”由于宝贵的时间被耽误在路上,最终导致红军“背水一战”。

新圩阻击,伤亡最大

湘江东岸小镇新圩距灌阳城不远,离湘江渡口40千米,镇外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咽喉,湘江首战于11月28日在此打响。当时,进攻新圩的是桂军,他们的意图是“不拦头、不斩腰、只击尾”,估计自己让出全州、灌阳防区的几天里,红军主力应该走得差不多了,现在只需拿红军后卫部队打一打,就能交差了。但由于军委纵队的行动迟缓,使得红军与桂军发生“意料之外”的殊死搏斗。

战前,红三军团五师和军委“红星”炮兵营(共3900余人)占领新圩—灌阳公路两边的山头,阻止从南面马渡桥杀来的桂军接近渡口。桂军7个团仗着人多势众,又有飞机支援,与红军展开拉锯战。长达三天的激战中,弹药不继的红军陆续失去尖峰岭、平头岭、虎形山等阵地,只剩下新圩附近的楠木山至炮楼山一线还能抵挡一阵,大家坚持到30日16时,终于盼来上级的电报:中央纵队已过湘江,红五师阻击任务已告完成,速将阵地移交红六师十八团,部队迅速过江。

接管阵地的红十八团打得更为艰苦,由于友邻部队纷纷过江,他们的阵地益发孤立,受到敌军全方位的攻击。12月1日拂晓,桂军猛攻楠木山,红十八团且战且退,没想到途
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,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。但这个时候,数万指战员心里谁也没想过自己会创造出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。他们中间有一多半也遗憾地没能踏上湘江对岸的土地,继续自己的征程。



木版画《红军长征过湘江》



油画《湘江战役》(局部)

中一支桂军穿插部队抢占炮楼山,将红十八团截断。尽管红十八团殊死抵抗,但由于桂军用火力封锁住道路,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。

其实,就在新圩之战形势紧急之际,中革军委曾于11月29日命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前去支援,阻挡北上的桂军。由于局势混乱,加上地形和道路不熟,红三十四师选择了一条在地图上看起来最短,实际上崎岖难行的山路机动,结果陷入莽莽群山之中,遭到敌军重重围困,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后来统计,新圩阻击战中,红军总伤亡超过8000人,占到湘江之战红军总损失的三分之一。正因为红军将士前赴后继的坚守,保证军委纵队全部及红八、九军团主力通过这一危险地带,赶到湘江渡口,居功至伟。

鏖兵觉山铺

11月27日,红一军团一个团从屏山渡渡过湘江后,奉命抢占全州,但比湘军晚到6小时,只好占领全州以南的觉山铺(一作脚山铺),防止湘军威胁军委纵队过江。觉山铺村位于桂(林)黄(沙河)公路边,距军委纵队确定渡河的界首渡口约30千米。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,桂黄公路沿着山脚穿行而过,其中以黄帝岭、怀中抱子岭最高,它们在公路南端,北来的敌人呈仰攻之势,而红军居高临下。

对红军而言,觉山铺阵地的最大缺点是正面太宽,所需兵力太多。鉴于湘军有6个师之众,红一军团长林彪将红二师摆在前线,还急令红一师主力防守觉山铺侧翼。微妙的是,当红军在27、28日加紧布防之际,呆在全州的湘军毫无动静,他们还是想保存实力,不想与红军硬抗。但在28日,蒋介石给湘系军阀何键发去杀气腾腾的督战电报,严令出击,湘军这才打起精神,对觉山铺发起进攻。

29日晨,湘军以第16师为前锋,以第62、63师为预备队,向红一军团阵地杀来。湘军的套路是“先轰炸,再冲锋”,用十几架飞机扫射目标,再伴随密集的炮击,等火力压制一段时间后,再用“人海”冲击红军阵地。一位红军指挥员回忆:“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,缴来的尖头子弹全给机枪用,步枪则尽量用苏区带来的土造子

弹。为了节省弹药,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,不管敌人怎样吼叫,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。”当湘军进入射程后,指挥员一声令下,所有火力同时打响,“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下,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猛,但无法压制住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,他们轮番冲锋,不让我们喘息。”

战至30日晨,湘军再投入一个师,火力也更猛,红军各部队凭险死守,相机反击。由于红军减员太多,经过几轮冲锋与反冲锋后,湘军判断出红军没有预备队了,遂改变战术,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搞“车轮大战”,一面以大部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,将红军的阵线拉长,再寻找薄弱环节突破。

湘军这一招确实狠毒,红军阵地前沿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,成为湘军向红军纵深推进的依托。战至晚间,红一、二师转移到珠兰铺防守,那里与界首渡口遥遥相望,若顶不住,湘军势必冲到渡口,阻断军委去路。这条新防线比原来的防线还要长,战士们能依托的全是低矮的小土包,地势变成南低北高,进攻的湘军正好居高临下,红军处境更为不利。

12月1日晨,湘军猛攻红一、二师的结合部,他们先对红一师三团阵地连攻九次,未能得手后,又扑向红二师四团阵地,那里的防线有5千米长,可红四团已减员至数百人,经过反复较量,红四团左翼被突破,一股敌军竟冲到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,形势十万火急。

面对退路被切断的危险,红一军团领导人当机立断,把所有能够战斗的人员都投入火线,坚决挡住敌人。接近中午时分,军委纵队基本过江,进入越城岭,红一、二师这才相互掩护,撤出阵地。觉山铺之战,红一、二师损失近4000人,但有效堵住了北面的湘军,保证渡口安全,为渡江的红军筑起一道屏障。

渡江! 渡江!

当红军后卫部队竭力抵抗之际,不懂军事的中革军委成员博古一筹莫展,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束手无策,只会不断骂人,而红军总司令朱德将临时指挥所设在界首渡口,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,现场指挥调度过江行动。

当中革军委领导人赶到渡口时,众人被当时的情况震惊了:天上,几十架敌机轮番投弹,江面上的浮桥不时被炸断,江上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;还没被炸断的桥面上,拥挤着扛着机器设备的红军队伍,不时有人跌入江中,四周阻击阵地上的枪炮声不绝于耳……

湘江之战中,界首是红军渡过湘江的头号渡口,仅有的几座浮桥都架设在这里,而敌人的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,浮桥一次次被炸断,又一次次重新架设起来。而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既要守渡口,又要警戒湘江西岸,还要承担部分断后任务,兵力捉襟见肘。掩护渡口的光华铺主阵地上仅有红十团防守,从兴安出发的桂军抓住红军人少的弱点,不断迂回偷袭渡口,最危险的时候,敌人距离红三军团指挥部仅100米远,甚至一度冲进界首渡口。为了保卫渡口,红十团拼死反击,团长沈述清在29日牺牲,继任团长的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于30日牺牲。正是靠着忘我的拼杀,红三军团恢复了界首渡口的畅通。

11月30日夜,红一、三军团等阻击部队已筋疲力尽,而红五、八、九军团仍未过江,红军处境极端险恶。12月1日,军委下达命令,要求“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”,“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,不顾一切牺牲……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破封锁线”。这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天,各个阵地上,国民党军倾尽全力展开集团冲锋,红军将士高喊“为了苏维埃共和国”的口号,扑向敌群,进行肉搏战。就在阻击阵地后方,一队队红军冒着弹雨渡江,浮桥炸断了,他们就抓住绳子、木板涉水,不断有人倒下,但队伍丝毫没有放慢前进的脚步,此时湘江之水已被染红。

战至12月1日17时,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终于过江。根据军委命令,负责掩护的红一、三军团撤出战斗,其他部队也陆续结束战斗。此后,红军主力继续长征,走上新路程。

用鲜血迎接希望

11月27日到12月1日,红军与国民党各路军阀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战。令人悲痛的是,长征开始时多达8.6万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后锐减至3万,数万人血洒湘江,当地流传着“三年不食湘江鱼、十年不饮湘江水”的沉痛话语。

这次血战是红军战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挫折,也是红军开始长征后遇到的第一个生死关头。有人说,红军长征犹如地球上一条醒目的红飘带,湘江战役是这条飘带上“最沉重的绳结”。其实,无论战前还是战中,红军都有机会避免完全对己不利的湘江战役,毛泽东曾三次提出“停止西进,原路返回”的建议,彭德怀曾两次就红军西渡湘江提出合理化建议,但奉行教条主义的李德、博古等领导人却不予理睬,令红军一再错失良机。为了掩护庞大的军委机关转移,红军采取“甬道式”队形行进,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,过湘江时,各野战兵团不被允许离开规定的前进道路,无法实施机动作战,也就无法争取或创造有利的歼敌机会。湘江战役中,敌人兵分多路阻截红军,红军也分兵抗击,结果每一处都变成“以少对多、以弱对强”的局面。

尽管遭受重大损失,但红军还是突破了包围圈,达成战役目的。战斗中,红军战士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,表现出极高的纪律意识、大局观念和献身精神,这一点连敌人也是敬畏的,湖南军阀何键在战后总结时就用了“实深惭愧”来形容其心境。更重要的是,经过湘江一战,博古、李德等人的“瞎指挥”彻底失去了红军上下的信任,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赢得了人心。

可以说,湘江之战用鲜血唤醒这支队伍,最终换来了红军政治、军事路线和战略方向的转变,从而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,对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
宋涛